

处暑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卷首语：露蝉声渐咽，秋日景初微

周质平：
冯友兰善变的根源

蒋梦麟：中国人的人情

蒋介石：日记里的“胡说”与“狐仙”

老照片揭秘幽灵日军
“大陆挺进队”真容

儒生的求索

国民党将领劳声寰口述淞沪血战

揭秘明代北京城的“双龙”布局

克里希那穆提：印记与记忆

目录

1 / 卷首语：露蝉声渐咽，秋日景初微

5 / 周质平：冯友兰善变的根源

19/ 蒋梦麟：中国人的人情

27/ 儒生的求索

35/ 蒋介石：日记里的“胡说”与“狐仙”

43/ 老照片揭秘幽灵日军“大陆挺进队”真容

54/ 国民党将领劳声寰口述淞沪血战

68/ 揭秘明代北京城的“双龙”布局

76/ 克里希那穆提：印记与记忆

| 卷首语 |

露蝉声渐咽,秋日景初微



“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

今日处暑。

处暑一来，燥热的暑气正式退出了这个季节的舞台。

告别暑气，静待爽秋，这是一个等待和过渡的时段，一如人生的境遇转换之前的短暂稍息。

凡历大喜大悲，必有通透穷理之得。人生的转换，是种历练，更是一次机会。

鲁迅的弃医从文，黄仁宇的弃武从文等等，终成别样的精彩绝伦。武人徐复观，从武到文，更有他独特的风采。徐复观曾这样自谦：“憬然有觉，转身从事学问，则迷途已远”。他是武人弃戈从文的一个特例。

他在论述“文化的中与西”中，曾提到：“只有知道自己国家的甘苦，知道自己文化的

甘苦的人，才能丝丝入扣地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而对于中国的命运，他的关注之切，早已注入他的万千言中。

宋人张载有句话如是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人以自强、文人以自励。

周质平先生在谈及“冯友兰善变的根源”时说到：“很少看到冯友兰这样的人，一方面当道在戏弄他。另一方面是他在戏弄当道。”作为一个文人，总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然而不管是顺从还是反击，这也早已成为历史，其中的是是非非，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褪去曾近的喧哗与热闹，真正留下的更值得我们去好好深思

一番。重读历史,品味那个时代的文字,不论回忆,抑或口述,都将会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处暑,处暑。一段热闹的结束,一个冷静的起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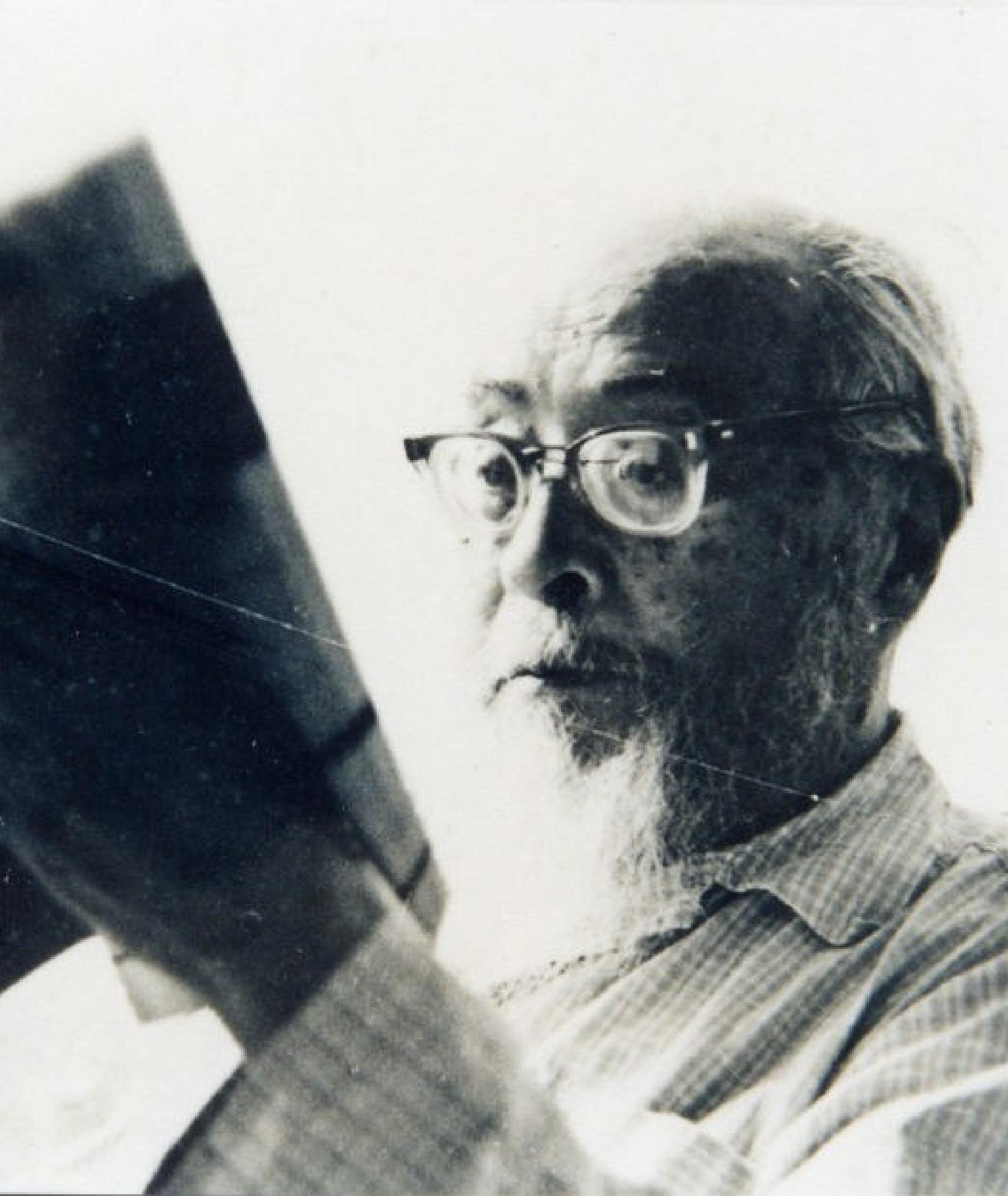
落叶飘落泥土,暑气隐遁大地。

人生起伏,境遇斗转,只需静心面对。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8月23日



周质平：冯友兰善变的根源

周质平就冯友兰的思想变迁为例阐述了中国文人气节与学术的关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他对政治的态度屡被后人诟病……

编者按：2013年7月20日下午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马勇做客九州出版社举办的“文人与气节——民国大师的道术变迁”读书沙龙。



（周质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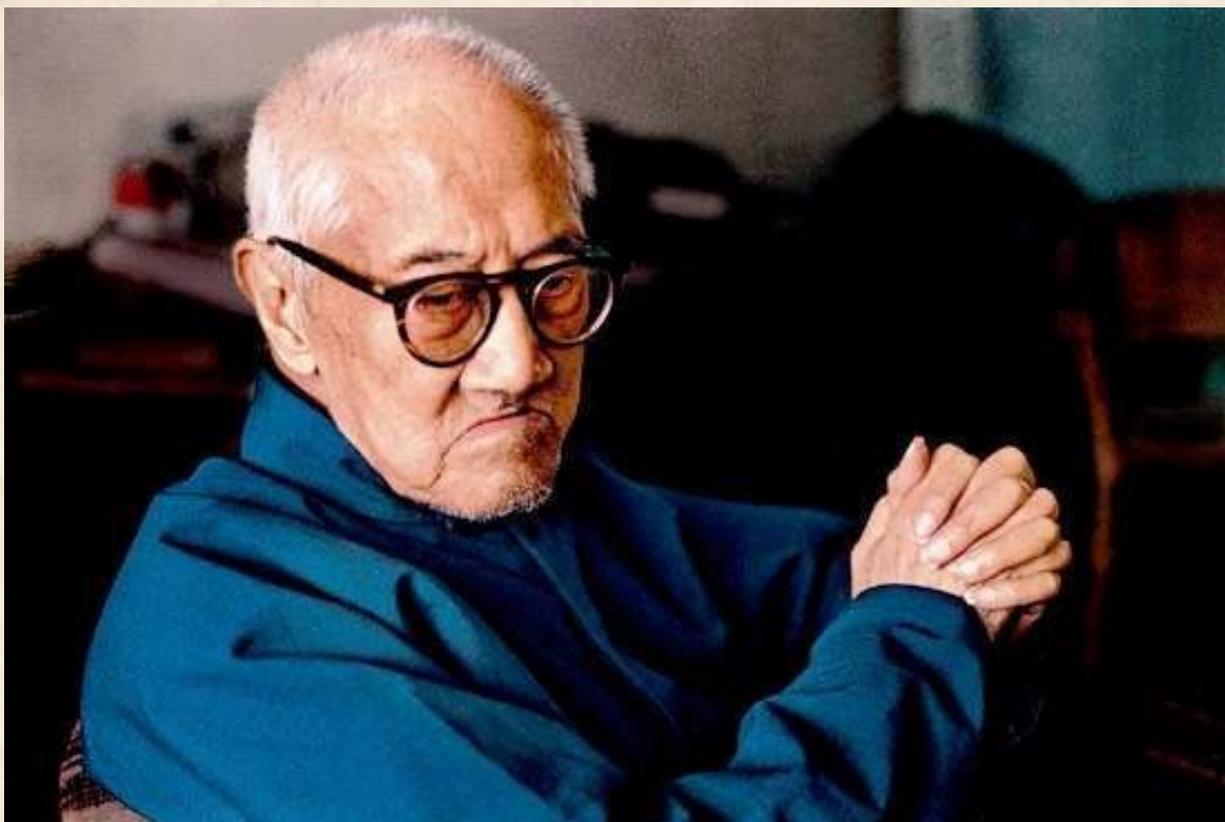
周质平就冯友兰的思想变迁为例阐述了中国文人气节与学术的关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他对政治的态度屡被后人诟病。宗教是使人信，哲学是使人知，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知”而不是在“信”，这是其善变的根源。周质平认为以气节来论人非常残酷，“中国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哪一个自由是更急迫的，我们总觉得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其实最基本的是有不说话的自由。”

以下为实录：



（陈寅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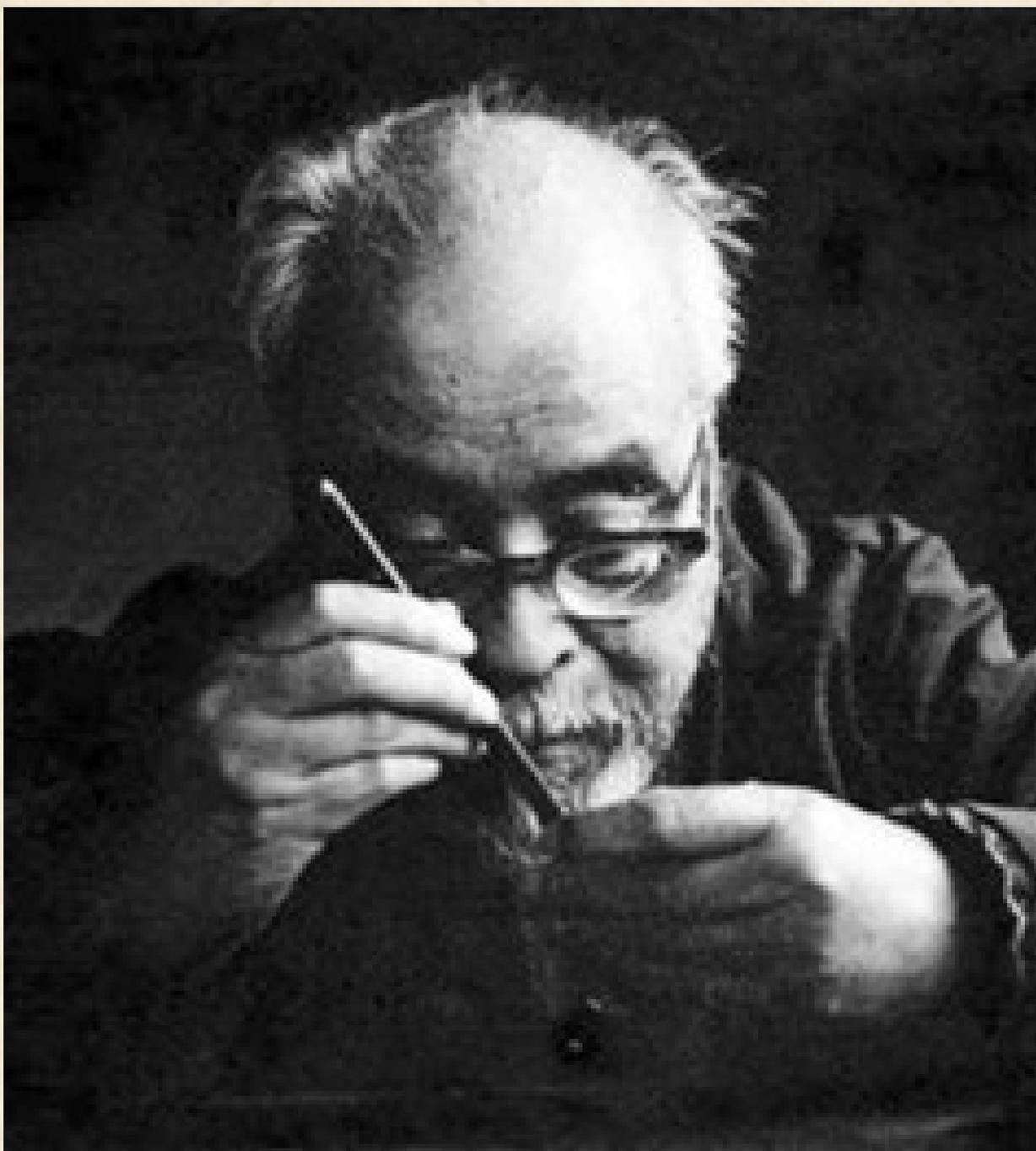
从80年代开始，特别受到关注的几个民国学人如梁漱溟、陈寅恪、吴宓，他们的全集和日记都出版了，什么原因大家对他们这么有兴趣？我想并非集中在这些人的学术上，我们讲到陈寅恪有多少人对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真的有兴趣，或者是多少人对他的《唐代政治史》有兴趣？讲到梁漱溟的时候，有多少人对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有兴趣？我觉得我们的兴趣是在他们对当道的态度上。所以，像余英时研究陈寅恪，与其说他是在研究陈寅恪的学术，不如说他想从陈寅恪非常晦涩的诗词中，找出一个答案。



(梁漱溟)

比如说梁漱溟 1953 年 9 月 16—18 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中和毛泽东一个争论,所谓农民的生活是在九天之上和之下的问题。当时被毛泽东破口大骂,在毛选中收录。结果,美国的学者艾恺的《梁漱溟传》开篇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敢和毛对抗,而且不屈服。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还说“不自昧其所智”的信仰。

我们说气节与学术,所谓气节这个字,定义是什么?无非就是知识分子和当道的态度。我们要区分硬骨、软骨和媚骨,以硬骨著名的梁漱溟,以软骨著名的是冯友兰。现在陈寅恪的研究之所以这么的热门,主要是因为其气节。他做历史所的所长,唯一的要求,我不能遵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否则我不就这个职务。像这一点能够在当时的情况提出来非常了不起,这也是我们的着眼点所在。



(冯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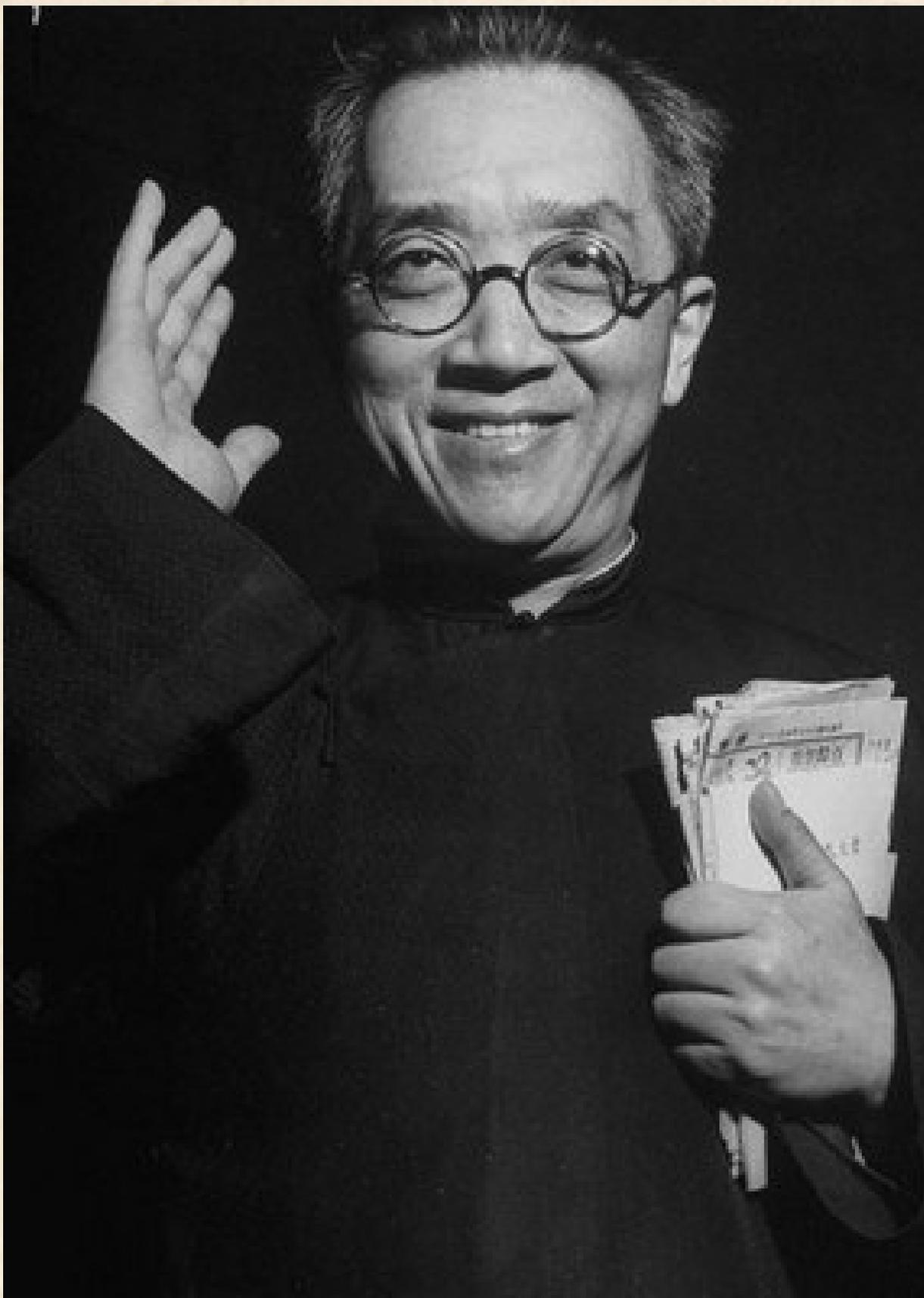
讲到冯友兰的问题，可以由几篇文章对他的批评开始。1950年代对他批评最直接的是张君勱，张君勱看了《学习与悔改》文章之后，写了公开信给冯友兰，“你读了圣贤书读了这么几十年，你即使因此而死，也应该死的很有意义，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这两个字吗？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忏悔和悔改”。1977年的是王永江和陈启伟写了《评梁效某顾问》某顾问写的就是冯友兰，骂他是御用文人。“你要好生记得伟大主席，跟你的高见”。到1987年台湾哲学家傅伟勋也是在这点上批评他。

以气节来论人非常残酷，但是这又恰是中国的传统。往往我们好像觉得气节比学术更加的重要，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历代都是奖励气节。在气节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问题值得我们关怀，一方面是看到无耻的文人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以冯友兰为例，冯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研究，在20世纪必须是第一人。他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胡适《哲学史大纲》被取代了，在海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几乎是国外大学中的定本，这样的地位在后人论到冯友兰的时候很少提到这个，都只会提他的气节问题。

我是想从冯友兰思想中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进行了一些分析。

1988年12月，我第一次会到大陆来，去北京燕南院三松堂特别拜访冯友兰(90多岁)。我们的交谈是通过他的女婿传译。

我看到冯先生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到现在都记得。我说，在您等身的著作之中，有没有后悔发表的文章？他女婿用河南话传译给冯友兰，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眼睛闭着就像我不存在一样。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把我轻轻地就给打发了，拒绝回答我。我又问“您觉得胡适的贡献怎么样？胡适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怎么样？”他说，“胡适的西学比中学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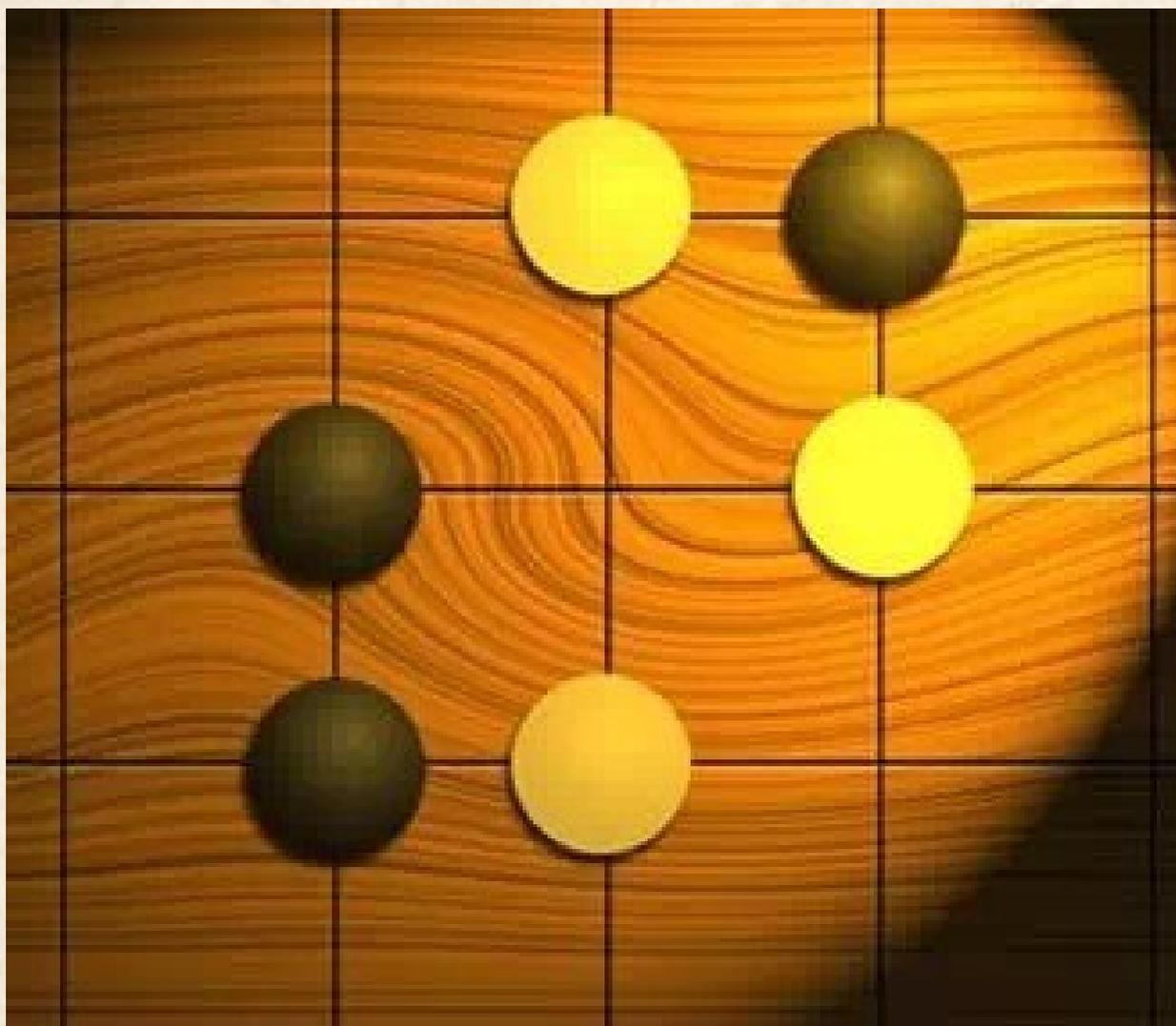


(胡适)

他虽然已经90多岁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脑子非常的灵活,回答得也非常的巧妙。我问,“您觉得传世之作是哪一个?”他说“《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引用了金岳霖的话,“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这句话传到中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冯友兰说“这个是哲学的真实

性质”。

我们在批评冯友兰善变、多变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思想上的根，这个就是他思想上的根。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他的绝笔之作，提出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惊讶，哲学是他毕生的事业，毕生的工作。在他去世之前他说“哲学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我觉得他这句话为他自己的多变和善变做了一个解释。哲学是为我服务，不是我为哲学服务，我们学哲学是提升人生境界，是为了享用哲学的概念，哲学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是为我所用，我不为工具所用，这个是冯友兰和传统中国哲学家和理学家在概念上很大的不同。



所以，他特别的提出来，宗教和哲学的不同。他

说，宗教是使人信，哲学是使人知。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在“知”而不是在“信”，这点是跟我们常常做中国文史研究和受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影响很深的人是不同的，我们在气节上论一个人的时候，也常常是在这一点上，认为“知之深，必须要转化为信之坚”，如果说我知道的我所坚持的就要信，在冯友兰看来，知和信是要截然分开的。

如果说你知了以后就变成了你的信，反而使你看不清楚，我本来是要看清楚这件事情，为因为我过分的信仰，却变成了障碍，他所要的绝对不是这个。他所要的是我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而不是对中国哲学的信仰。

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分的比较开，在中国往往是混在一起，他把人生的境界分成了几个境界，他认为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的境界，在天地的境界是我对所有的价值已经无所肯定了，我不再肯定某一个价值是正面的，某一个价值是负面的，天地的境界比较接近庄子，他也做了庄子英文翻译和注，都做了一定的工作。



（庄子）

在冯友兰看来，你们不免是一个道德境界的人，来批评已经在天地境界的人，我为何要在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看来，我为了要谋生存什么都可以做。比如说孔孟的仁义礼智为我所用，庄子为我所用，马列主义也可以为我所用，这里面没有什么所谓坚持或者很难的事情。

我们往往把冯友兰的改变认为是经过的一番挣扎和痛苦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自己到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也说的非常清楚，我只是为了生存。最后，他说言必信、信必果这是一个侠义的概念。言不必信，信不必果，唯义所在。如果说言行合一的境界，这是一个侠义的境界，言行合一未必是圣贤的境界，不合一你的标准在什么地方，是“唯义所

在”，“义”，义者宜也。我为了生存今天可以尊孔，明天可以反孔，你们在批林批孔的时候，让我出来反孔，我就反孔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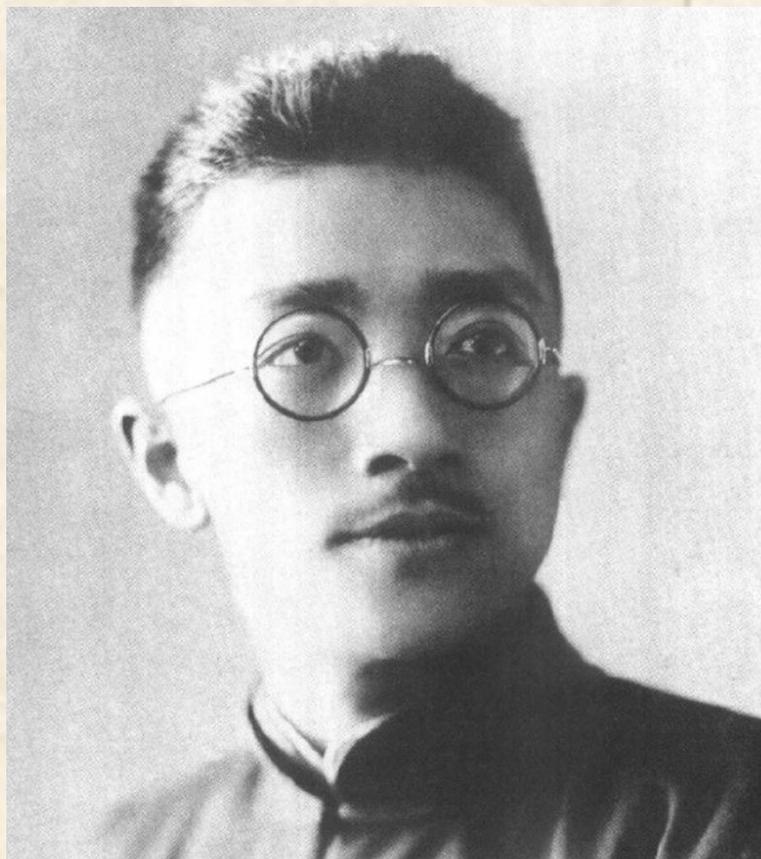


在中国哲学史中，把孔子认为是中国开始的第一人，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反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磨难、屈辱，我们常常把这个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或者是戏弄知识分子，很少看到冯友兰这样的人，一方面是当道在戏弄他。另一方面是他在戏弄当道。

毛泽东在这一点还是比较高明的。1949年冯友兰见毛泽东的时候马上表示，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说“我在5年内要以马列的新观点来重写哲学史”，毛泽东说：不必过急，慢慢来，还是以老实为宜。毛泽东的信是1950写的，从1950到冯友兰去世，又过了50年。

胡适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角度来批评当时在信仰上有所改变的人。胡适说，我们对他们要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胡适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人不但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

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哪一个自由是更急迫的，我们总觉得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是有沉默的自由，不说话的自由。



(胡适)

所以胡适对冯友兰、周易良等在当时悔改和认错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是无限的同情，胡适从来没有用一种气节来论人，用气节论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胡适所反对的以理杀人。戴震说，以法杀人已经非常的可怕了，以理杀人更加的可怕。

冯友兰是不是完全的没有反抗？冯友兰有他的反抗，他的反抗从两个角度来看，他在必须改变的时候，动不动就在他的序言里面写“我又脱胎换骨了”，一直到最后，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本的第七卷，在里面有所反击。

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反击，如果说从司马迁开始是写历史，冯友兰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写中国现代哲学

史。他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他的命运跟王船山比起来还不错，9年以后就出版了。

这本书也非常的好，如果大家对近现代思想史有研究就知道里面写了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胡适、他自己等等，他写毛泽东的时候，说毛泽东的思想经过了几次的转变，从一种理想主义到幻想主义，演变为发狂式的幻想。这些话一直在他去世前一两年才敢说。等到他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他又病了，他在病中说，“不必送我去医院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像冯友兰这样的人也非常值得敬佩，他的精神可以用四个字“受禄不愧”来概括，他也有自己的坚持。不管在什样困难的情况下不发疯，不停止写作，说假话也可以，能够不断的创作，能够活下来，能够把《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七卷写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方面他虽善变，另一方面要对他们的坚持给以相当的敬意。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蒋梦麟：中国人的人情

◎ 蒋梦麟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末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



我们说，学以致用，那末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

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又有什么用。

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愿意搭乘，因为它

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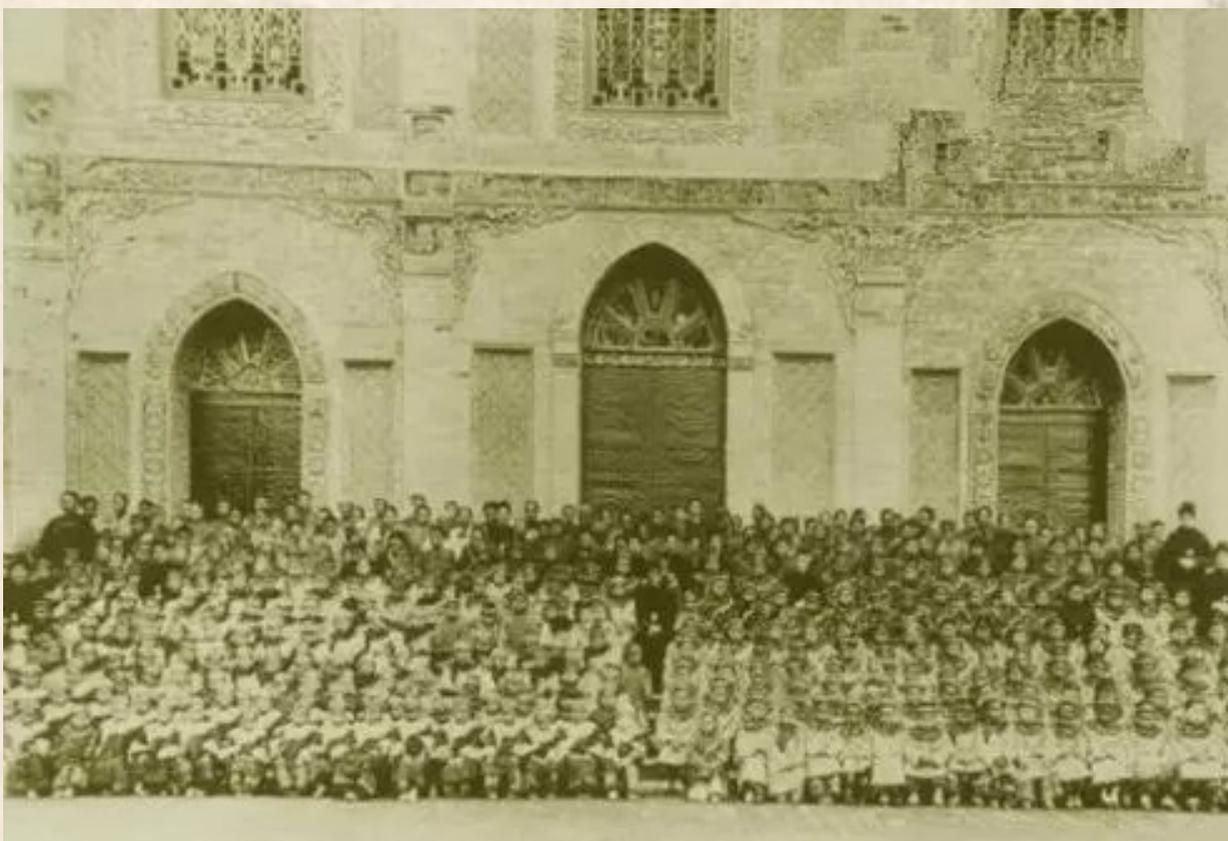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平民检查口腔疾病)

我父亲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我们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我们咳嗽药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

那末，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末，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我们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我们应崇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

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那末，我们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

身上时，也许喜欢托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崇拜你们的上帝，我们还是崇拜我们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我们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

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需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需时，通达人情的中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律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不是减轻了吗？



(中国茶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

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作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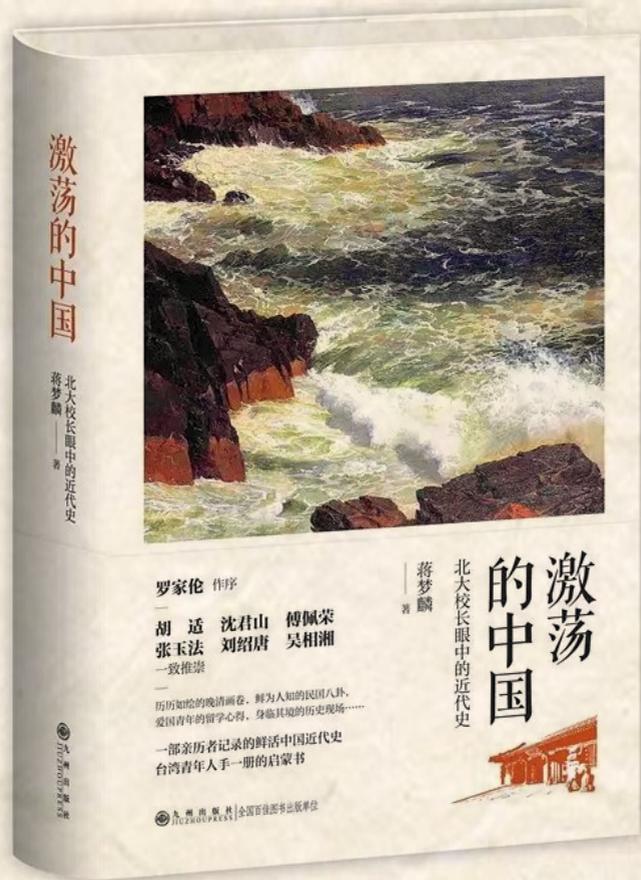
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末，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本文选摘自《激荡的中国——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

蒋梦麟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蒋梦麟以饱含风趣和人生智慧的笔触，娓娓道来他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映照出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

从传统浓厚的余姚到开放繁华的上海，眼见社会的种种变化；再到留学海外，感受文化的差异，思考国族的未来；最后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他始终秉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掌握着北大之舵。

在抗战时期，他站在历史台前，用温和有力的双手保护学生；在和平时代，又把五四精神成功推广于农村建设。他是那时青年人的启蒙者，影响一直到现在。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孔
孟
之
道

儒

儒生的求索

◎ 嵇嘉理/文

宋人张载有句话如是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宋

人张载有句话如是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人冯友兰将其简称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传承数百载而不衰，无数人将其立于案头以自励。这几句话在文人自励的同时也成为他们绝好的写照。

在这些以“横渠四句”自励的文人之中，自然也少不了这样一个人——徐复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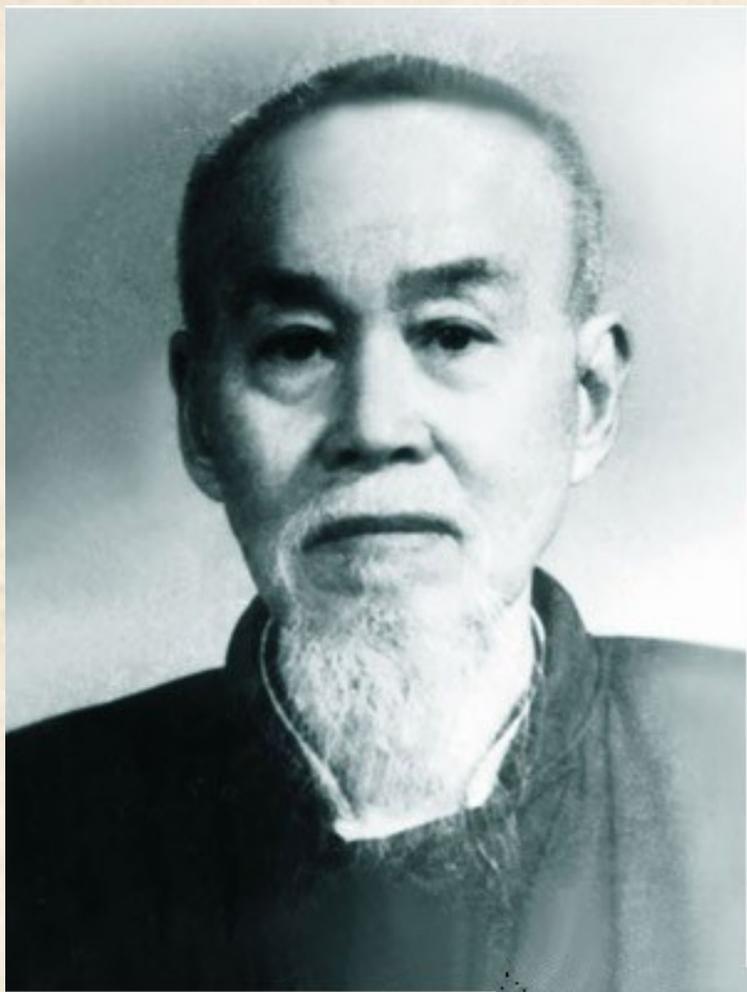
（徐复观先生与王世高女士，1981年于美国休斯敦）

中国的文人向来具有投笔从戎的传统，汉有班超，清有曾国藩；但鲜有武人弃戈从文之说，“从文”好的就更不必说了。显然徐复观是个特例。

“憬然有觉，转身从事学问，则迷途已远”，徐复观这样自谦。

中国的儒学在支撑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之后，在近代遇到空前的挑战。静安自沉于昆明湖，空留“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之叹。“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何其难也？

1940年代，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徐复观拜入儒学大师熊十力门下。寻求民族振兴之道，寻求儒学复兴之法。



(熊十力)

“只有知道自己国家的甘苦，知道自己文化的甘苦的人，才能丝丝入扣底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很显然，《学术与政治之间》所要做的就是弥补国家的需要、文化的需要。

在徐复观看来，中国的儒学并没有阻碍中国的思想发展，或者说中国思想发展的裹足不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儒学。中国思想发展的阻碍其实质是因为“专制”。因为专制，从周秦之际到汉武年间，儒学退步了；天意从“民意”沦为“灾异”。而专制之力一旦卸压，中国的学术便得到大发展，如周秦之际，如明清鼎革。其实民初也可以计入在内。

当然，徐复观也并没有沉迷于国故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规律，那就是治乱更替的周期律。这个怪圈式的周期律，徐将其称之为“中国历史的死结”。要想终结这个死结，单靠中国文化是不够的，徐复观在书中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个死结成因归于一点那就是君民之间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对立。而这种从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考量来讲，是不可调和的。人总是要犯错的，除非圣人和傻子。非要把“人君绑架上圣人的神龛”，这也是对人君的一种虐待。

解开这个死结的关键在徐复观看来其实就是德先生。而类似的思想，毛泽东也曾表述过，那是在1945年窑洞谈话的时候，那时候有个著名的听众——

黄炎培。



(黄炎培)

五四运动高举着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其中德先生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只不过等先生根基未稳。“我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从这种层面上来讲，徐复观的眼中的民主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民主或者儒家式民主。

对于中国的命运，徐复观的关注之切，力透纸背。对于国民党，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而对于共产党，徐复观也对斯大林式的苏式政党抱以深深的担忧。而苏共二十大之事被其言中，更加深了他的这种忧虑。所以，徐复观“寄托于变了质的国民党或变了质的共产党”，颇有现实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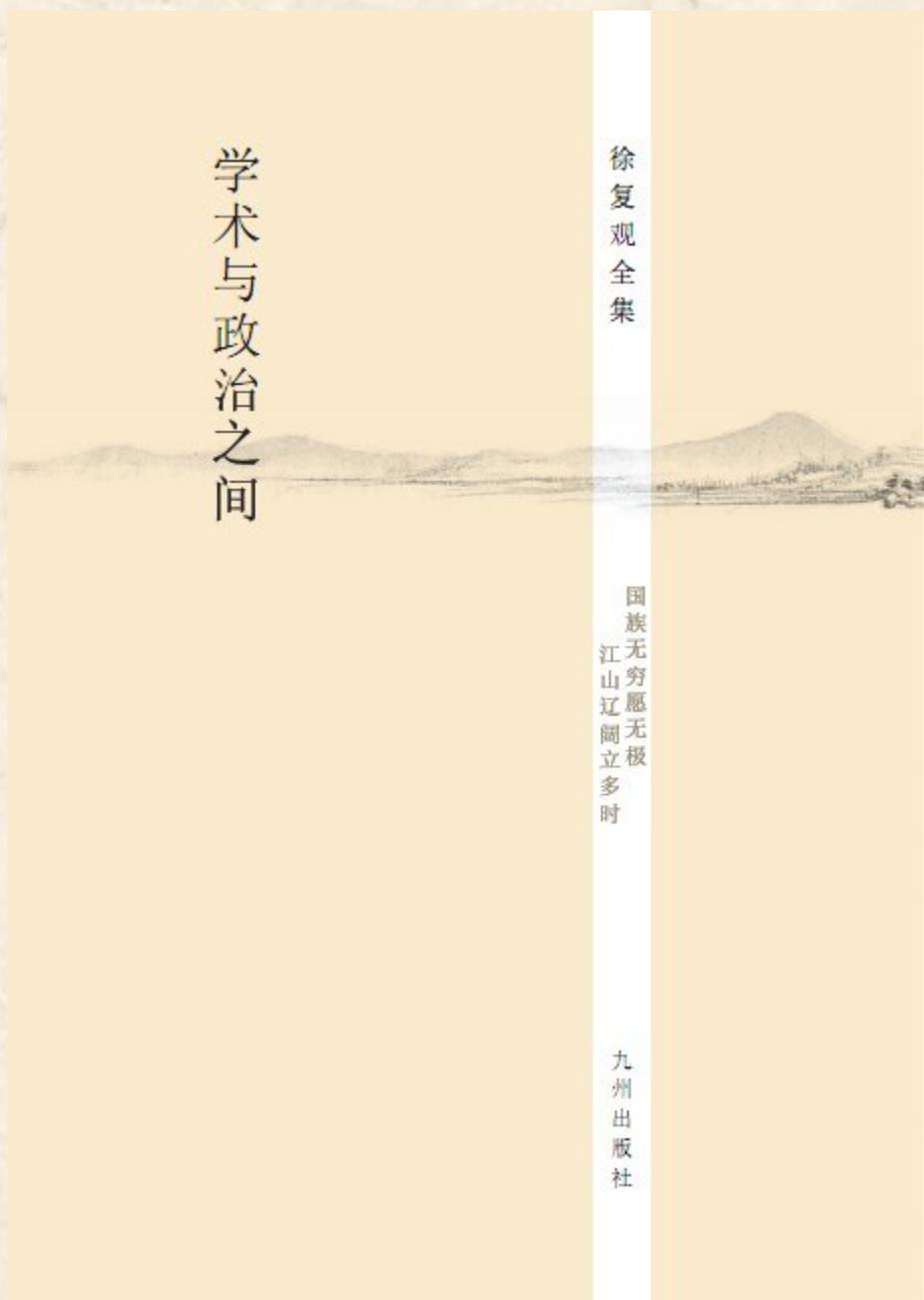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与其说是对中国命运探索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徐先生的一种自我鞭策。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回观两岸，距离徐先生的期许，还是有着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相关图书《学术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学术与政治之间》收录了徐复观赴台前后的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这段时期是徐复观从政治到学术转变的时期，他把从政的体验逐渐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体验，把这些深切的关怀倾泻在字里行间，所以他把这类文字定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早年文笔辛辣，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的争议，《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还曾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尽量还原了徐复观手订时的原貌，很多文章在大陆都还是第一次出版。



蒋介石：日记里的“胡说”与“狐仙”

◎ 段 炼

转眼间，“我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胡适一生最为风光也最引人议论之处，或许在于身为学人而格外热衷政治……



转

转眼间，“我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胡适一生最为风光也最引人议论之处，或许在于身为学人而格外热衷政治。虽然他不止一次声称，自己对政治的关切乃是“没有兴趣的兴趣”，也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

不过，少年时代即享大名的胡适，“出山”的愿望和乐趣实在太大。从留美期间苦练演讲、撰写时评，到中年之后出任大使、折冲樽俎，胡适在学、政两界之

间长袖善舞，实为难得。

曾经为胡适写作《口述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好比玻璃缸里的金鱼，每一次摇头摆尾，都被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看得清楚却不等于看得明白。毕竟“出山不比在山清”，胡适在政治上虽然进退裕如、引人注目，但背后甘苦则多不为外人知。

其中，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最有意味。从1927年蒋宋婚礼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到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会议上去世，两人相交达三十五年。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纱照)

根据新闻照片和公开文献，胡蒋相见，谈笑风生，似乎毫无芥蒂。然而，对照《胡适日记》与最近由斯坦

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彼此的感受却相当歧异。

1932年，两人在武汉第一次见面。胡适日记详细记录谈话内容，看得出，他信心满满地准备了满腹诤言，“预备与他（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没想到，当天蒋介石约见的并非胡适一人。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这让胡适“有点生气”，抱怨“不知他为何要我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谈着墨不多。除了“其人似易交也”的记录外，完全没有感受到胡适“有点生气”。这类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两人日记中记载甚多。

而两人最直接的一次“交火”，在1958年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之上。当时，蒋介石盛赞胡适的“能力”与“品德”，并号召中研院“复兴民族文化”，“配合当局”实现政治使命。然而，胡适却起身公开反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直言赢得学界尊重，而蒋介石居然也能够当面容忍，一时传为美谈。不过，蒋介石回去后，在当天的日记里指责胡适“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大狂人”。这件事使蒋介石“终日抑郁”，到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服用安眠药之后方才入睡。



（1958年，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时留影
（第一排左至右：张群，胡适，蒋介石，朱家骅））

显然，不管参政还是议政，胡适更希望通过自己学界影响力，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因此，他重视的是书生意气的直言与政治人物的雅量。他反复引用范仲淹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表此意。不过，在蒋介石眼里，他则期待这位学界领袖成为自己的“诤臣”，所以更看重胡适的忠诚与认同。因此，二人虽有共识，但彼此定位不同，期待也不一样，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1953年，胡适曾向蒋介石“说了一些忠言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似乎印象不错。但在蒋介石的日

记里，却责怪胡适“高调”。从两人的交往史来看，蒋氏欣赏胡适“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但也批评胡适“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脱除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1952年，由美国抵达台湾的胡适发表公开演说）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蒋氏看来，胡适所言是“真正‘胡说’，本不足道”，不过，他也相信，“胡说”对政府“亦有其裨益，故仍予以容忍，其人格等于野兽（之狂吠）”。所以，在多次或明或暗的冲突中，蒋氏一方面公开礼遇、赞美胡适，一方面也在日记当中，指责胡适是“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

何讨厌也”，甚至直斥胡适“为一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

终其一生，胡蒋二人只能是若即若离、藕断丝连。1962年，胡适猝逝。蒋介石亲笔题写“智德兼隆”四个大字，镌刻于胡适墓冢之上，可谓备极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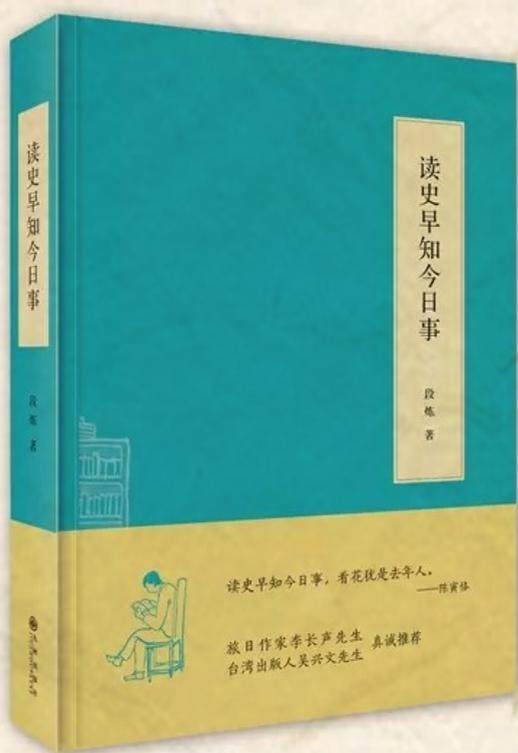


对于胡适一生定论，最耐人寻味的，也莫过于蒋氏那副白话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根据蒋介石日记，他在散步“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又说，“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不偏不倚，可谓深得中庸之道，不知胡适能否接受这份迟到的“公平”？

本文选摘自《读史早知今日事》

段炼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从胡适、陈寅恪、钱钟书谈到马克斯·韦伯、托马斯·曼和《圣经》翻译，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交融，让历史转捩点上的旧影新知，成为贯穿这本读书随笔饶有兴味的主题。游走于故国与异邦，作者重寻东西方经典的曲折脉络与知识分子的彷徨心路。思考慧心独具、引人入胜，文字典雅流畅、妙趣天成。一卷在手，足以让读者穿越时空，领略人文天地的博雅气象。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老照片揭秘幽灵日军“大陆挺进队”真容

◎ 萨 苏

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布衫像是教书先生的人,手里却提着一挺轻机枪,一边疯狂地对国民党守军扫射,一边往前冲……



（日军“大陆挺进队”的特工成员，其肩上扛的，是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最优良步兵武器——捷克ZB-26轻机枪。原照片标注：“除了四肢和脑袋是日本造的，其他的一切都要和中国兵一模一样，这就是中野学校苦心设计的效果”）

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布衫像是教书先生的人，手里却提着一挺轻机枪，一边疯狂地对国民党守军扫射，一边往前冲；另外还有几个农民打扮的人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也抱着机枪朝前冲。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守桥的国民党军们还没有明白过来，就有两个武装便衣冲到最近的一座防御工事，围着工事开枪。他们没有找到工事入口，便掏出一颗手雷从枪眼塞进去。“轰”的一声这座防御工事被炸毁了。两个人又扑向另外的工事。这时，南岸上还有几个守桥的国民党军士兵眼睁睁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发呆。一下子，从人群中又冒出来十几名化装成难民的日军……



(谁能想到，街道中央背对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两个人，其实是日本特工化装的？这张照片似乎曾被中国一些报刊使用过，误作为抗战时期后方的图片，却不知这是日本特工拍摄的日本特工现场活动记录)

这并不是电影片段，而是布防在江边小镇新市的国民党军中一名入伍才一年的新兵杨佩尧的回忆，1942年9月24日，他正与战友们一同守卫在新市浮桥码头边的阵地上，就看到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中国战场，日本陆军曾组编一批十分神秘的部队。他们可以讲流利的中文，熟悉中国军队的口令和指挥模式，经常穿插到中国阵地后方，执行袭击、暗杀、侦查等特种任务。他们在中方腹地活动时穿中国军装或便服，使用中国军队的武器，令人真假难辨，危害极大。文章开头的这段文字，描述的就是中国军队在面对这支奇特的日军时猝不及防的典型场面。



（在日军的偷袭中，伪装成中国兵的日军特工，在一座桥的桥头遇到守卫在这里的三名真正中国兵。尽管他们忐忑不安，但中国士兵显然没有看破，竟然微笑着迎接这些化装的幽灵）

这批敌军，就是日军情报培训机关专门建立的，以中野学校毕业生为主组成的化装袭击部队。日军中野学校，是日本陆军建立的，以特工活动为主的特殊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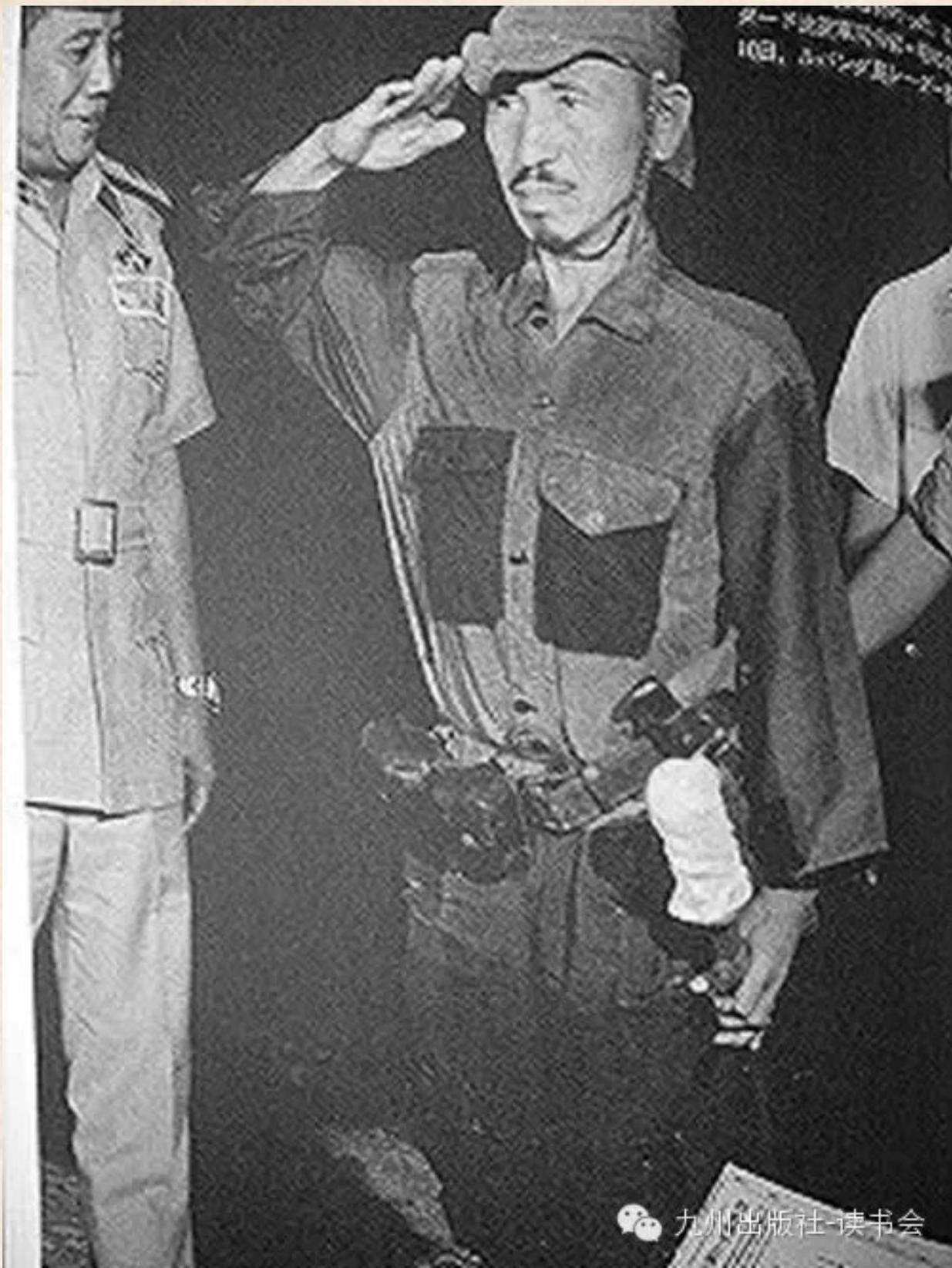
这所学校的学员，大多有较高的教育基础，一入学就被灌输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有针对性地模仿对手国家军人或平民的生活，学习期间不能说日语，只能说所模仿国家的语言。据说，其中国班的学员，取得毕业证书前必须到中国实习，要求能够和中国人一起住宿而不被识破才算合格。



（在宿舍中吃饭的日军特工，据曾偶然到这里的日军其他人员形容：“乍看起来，仿佛如同战俘营一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的毕业生组成特种部队，在整个东亚战场从事谍报、颠覆、侦查等活动，无论在爪哇还是特鲁克群岛，在苏蒙边界还是越南丛林，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被称为“最后一个日本兵”，一直到1974年才在菲律宾丛林中放下武器的小野田宽郎少尉，就是中野学校培养的特种部队成员。他1944年奉命在卢邦岛上进行游击作战。在日本战败后的二十九年间，始终通过射杀当地农民和司机，烧毁物资，作为支持他认为尚未结束的“圣战”的手段。中野学校部队的凶狡顽固，训练之严格可见一斑。



（投降仪式上的小野田宽郎，他在战后先后射杀了130名无辜菲律宾人，被称为“卢邦岛上的魔鬼”）

作为日本陆军最大的战场，中国战场也是中野学校人员极为重视的活动舞台。在这里，日军大量使用化装袭击部队，在多次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日军渡黄河之战，就以伪装成中国人的特种部队先锋，日军在缅甸同古遭到戴安澜师顽强抵抗无法突破时，也使用特种部队冒充缅甸人，赶牛车试图钻隙穿

插中国军队战线。在华北的作战中，日军也曾编制专门袭杀八路军领导人的益子重雄“挺进杀人队”。

日军化装袭击部队在中日战场上屡屡出现，使编制庞杂，而且缺乏统一指挥的中国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由于日军对其化装袭击部队始终讳莫如深，所以，其真容一直如同隐藏在五里雾中。比如，杨佩尧的回忆中提到的那支日军，直到1965年才被确认为中野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大陆挺进队”。



（“大陆挺进队”是一支中队建制的部队，照片前排左侧为一名小队长，右侧为该部队中队长）

由于当时有日军原部队成员披露了其作战过程，中方研究人员才对这支部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侵华日军便衣特工队揭秘》中，有这样一段根据日文资料对该部队的描写：

他们先是进攻长沙，任务是潜入中国部队后方，搅乱中国的防线，为攻击部队担当尖兵，并打开通道。开始时，他们穿中国军服混进中国部队里，还故意穿着不整，装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无论怎么看都跟中国兵一样。有时又扮成难民混入人流向中国守军背后穿插。

侵占长沙后，“大陆挺进队”的老巢就安在长沙。他们的宿舍完全像是中国兵营，床上、墙上挂的，都是中国的枪支和物品，随时可以化装出发；只有在整队离营时，他们才会敬上一个标准的日式军礼，然后就完全像中国军队或者难民一样活动了。



(目前，在日本网络上唯一流传的“大陆挺进队”成员照片，背后可以看到其使用的美制汤姆森冲锋枪——这是中国军队当时经常使用的武器)

几十年后，这支“大陆挺进队”的老鬼子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仍然兴奋不已：当他们领受任务悄悄地通过前沿时，有时会被不了解内情的日本兵发现。看见身着中国军服的挺进队员，日军都紧张地大叫“敌人来了！”

有一次在湘西，“大陆挺进队”前去袭击中国后方的机场，经过一座铁桥时，简直就像偷袭汨罗江浮桥的重演：中国守军还以为是自己人，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为他们送行。而装扮成中国兵的日军特工队员却按捺不住心中的窃喜，嘲笑着中国军队的善良！当他们举枪偷袭时，守军士兵还没明白过来就陷入了血光之灾。



（日军特工队的出发仪式，从照片看，据日本军人回忆：“只有在整队离营时，他们才会敬上一个标准的日式军礼，然后就完全像中国军队或者难民一样活动了”）

这可以算是对侵华日军中化装袭击部队最详细地描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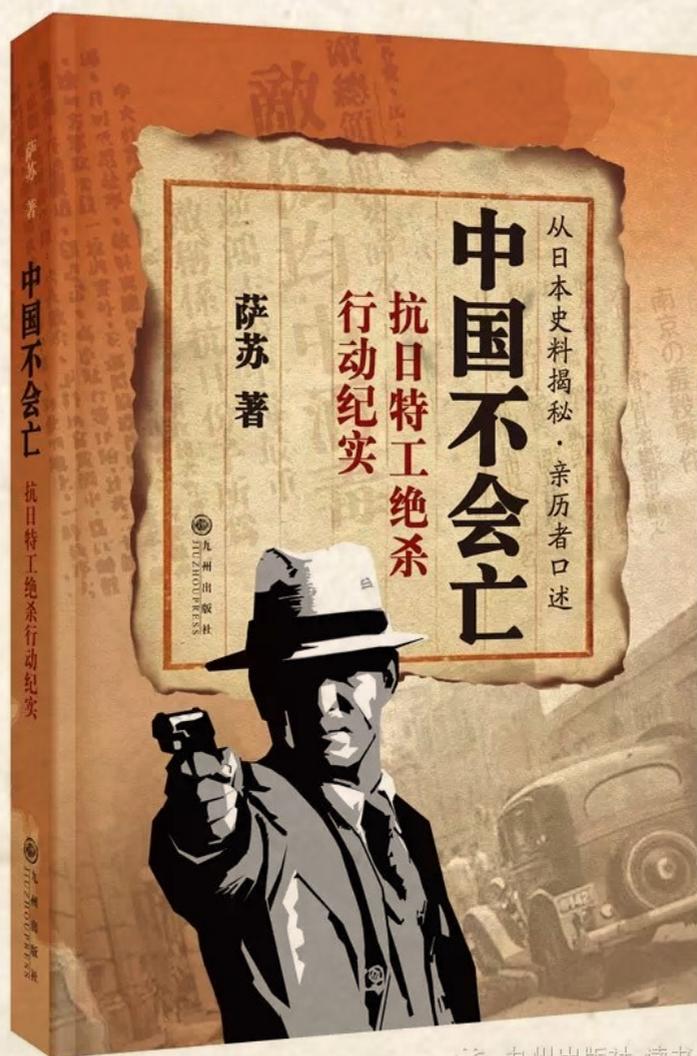
近日，萨在整理收集到的日本旧杂志时候，意外发现，其中一批照片，描述的正是这支“大陆挺进队”，而拍摄的场景，恰恰和上面文中所描写的内容极为接近！

日军“大陆挺进队”根据记载，其番号一直存在，一直到日军战败时，才放下武器。但是，正如前面照片所提示的，在这场特工之斗中，中国方面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也给敌军造成了一定损失。这些日本旧照片，可算从一个特殊角度，展示了抗战中略带诡异的一幕。

本篇内容选摘自《中国不会亡》

萨苏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喋血疆场的烈士之外，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与日伪展开激烈较量。旅日历史学者萨苏，在日本生活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本书就是作者从日本史料，从“敌人的眼睛”里，发现和记述的中国抗日特工鲜为人知的史实，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敌后谍战，特别是十几宗经典绝杀日伪行动的全过程。全书分“人、鬼、刑、兵”四部分，既有中国特工人物传奇，又有敌方特务组织背景揭秘，还有抗联武装特工和军统培训、特工装备等内情披露，以独特视角，全面、深入展现了中国抗日隐蔽战线谍战史。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国民党将领劳声寰口述淞沪血战

日人撤离青岛以后，我团亦奉命急开淞沪。此时我们已不敢乘船，只是急行军到海州，搭陇海路火车到徐州，转津浦路南下，八天之内赶到……



(劳声寰先生)

日 人撤离青岛以后，我团亦奉命急开淞沪。此时我们已不敢乘船，只是急行军到海州，搭陇海路火车到徐州，转津浦路南下，八天之内赶到。自八一三到现在，打了将近一个月了。我团在南翔下火车，立即接到税警总团团长黄杰的命令，我团归第八师师长陶峙岳指挥。待全团下了火

车,就遇三十六架敌机来袭,部队就近处分散掩蔽,我个人则冒险到丁家桥第八师师部去报到。

陶峙岳师长说:“来得好,我们已打了十天了,伤亡惨重,敌人窜入蕴藻滨南岸,八个村庄已陷,我们部队正在继续抵抗中,你们去恢复阵地。”这是我团所接到的第一个简单命令。我回团后即挥军前进,这是我团第一次和敌人作殊死战,士气好,斗志高,不过伤亡了三分之一,一千多人,才把八个村庄恢复。

事实上陶师长不讲实话,八个村庄是已全丢了,没有部队继续抵抗,我们是硬攻克服的,伤亡也够惨重了。达成任务后,我又到师部去报告,陶峙岳当着我的面向朱绍良打电话报告:“报告长官,早上以来,发现火线上有小的空隙,少数敌人钻进来,税警五团来了,把少数敌人驱逐了,南岸已无敌踪。”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减轻第八师失陷阵地的责任,但亦掩盖了我团的战功。当时即认为此公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案后来陶“叛国投匪”)。



(我军野炮队在上海攻围战中)

此后我团就防守蕴藻滨南岸，足足打了三个星期。为了守住南岸阵地，必须掌握对岸的一个突出据点——石驳岸，双方均尽力争夺此一据点，遂成为敌我火网交会的最危险地区，我们未来之前，我方友军五次各以一连人冲锋过去，每连人过去支持三五天就打完了。

我们逐出南岸敌人以后，马上就要争夺此一据点。我团派机关枪一排步兵一排带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由一个连长带，过了河冲过去，我们在后面火力支援，攻克了。由于有机枪的缘故，他们支持了十天，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我们再派一排上去，被派的没有一个讲话的，提了武器就冲过去。他们在前面守，白天都不能和后方交通，我们只能利用晚上送饭过去。所谓饭，是于黄昏后煮的送到前线已冰冻了，也只能在黄昏及天亮前各吃一次充饥而已。由于要争夺此据点及南岸正面，我们牺牲惨重，全团只剩下二千二三百人了，不过我们在南岸正面也打死了约一百四五十名想冲过来的敌人。



(淞沪会战旧照)

我们支持了三个星期，胡宗南的部队开上来接防，我团退到大场北边马桥宅归三十六师宋希濂指挥。不久，奉命掩护两广部队反攻蕴藻滨。由于我团有平射炮、高射机关枪，坦克来了用平射炮对付，飞机来了用高射机关枪对付，所以敌人坦克飞机都似乎避开我们正面，最初二十天，伤亡不到二十人，是一个大奇迹。不过后来敌人密集舰炮及野战炮，猛烈轰击我方阵地，我团约有二三百人被击毙于工事里面。

两广部队的装备不行，反攻顿挫。而胡宗南部正面吃紧，向黄杰要求调用我团的平射炮和高射机关枪。黄杰与胡宗南交深，为了前线急需没有拒绝。不幸的是我们交出这两种利器以后，敌人突然地向我团正面进攻，坦克、飞机一起来，我们没有力量对抗，两天之内，伤亡一千多人，打不下去了。上面命令我们

退到苏州河南岸整补。



（日军向我军阵地攻击）

自九月上旬起，税警总团陆续参加淞沪之战，皆以团为单位，分别配属国军各师指挥，填补各师正面，置两个支队司令及总团部悬着，至各团为各师作战伤亡过半以后，始自苏州河南岸防卫战起，方以总团统一指挥作战，而两个支队司令何绍周、王公亮也同时更换了，第一支队赵公武、第二支队孙立人兼，派系人事问题竟于战场上闹开了，殊深慨叹！



（税警团士兵）

我团最后的一千两百官兵退到苏州河南岸，上面调八百名各省的缉私队队员来增补。这种队伍比警察都不如的，不能打仗的。名额足足八百，但沿途逃亡，带到的不到三百。最荒唐的是带来的那个连长交出队伍以后回头就跑，这是临阵脱逃，死罪。为了维持军纪，我立即开枪格杀。这才把带到的部分稳住。整顿了一整天，次日就接到命令归税警第四团团团长孙立人兼第二支队司令指挥，原来的第二支队司令王公亮已调开了。

我团随即在苏州河南岸占领阵地，收容前线退下来的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是宋希濂师，第八十八师是孙元良师。这两师血战两三个月，奉命后撤，我们收容时才知道十八师朱耀华师长已自杀成仁，而孙元良的一部由团附谢晋元率领死守

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即闻名于世的八百壮士。



（中间坐者为谢晋元）

我团奉命防守的阵线是苏州河南岸的极斯斐而路，正面正中是周家桥镇，正面右边是丰田纱厂，左边是北新泾。背靠水泥厂及周

家桥镇市街。首先我们必须扫清射界，须放火烧周家桥店面，否则敌人放烧夷弹及炮击，我们背后成为火海，岂不自陷死路。不料商户百姓不肯退出店铺，还企图保有财物。我们不得不先驱逐他们，再放火烧房。

其次我们得做好工事。但此路是柏油路，又没有爆破工具，只好拿沙包、米包、洋纱堆砌，盖上钢板，做成阵地。靠着这阵地，我们死守一个星期。对岸的啤酒厂系钢筋水泥建造，楼房三层极坚固，破坏扫清困难，敌据此瞰制我阵地，并作掩护挖对壕推进浮桥入河中强渡，敌人一个大队集中强渡，在优势火力与飞机掩护下分数波猛冲第三营阵地，终被突破，惨遭严重损

失，朱恺仁、罗敬持两个营长重伤，李高营长阵亡，不幸的是丘之纪团长亦壮烈殉国于第三营阵地刘家宅。



(1937年5月，丘之纪将军一家在青岛汇 炮台留影)

原先，除了有特殊任务须各自去做以外，我和团长是形影不离的。但因战况过于激烈，我俩经常在前线督战，上级打电话到我团指挥所常找不到我们。因此黄杰总团长指令团长与团附分开，一在指挥所一在前线，轮番负责，既便于指挥督战，又便于与上级联络。

就在此令下达的次日晚上，丘团长到前线去督战巡视，到了第三营正面即被敌人机关枪扫射，他和两个卫士一起阵亡，而第三营可能比丘团长还早就没有了。我在指挥所发觉团长没照预定时间回来，呼叫第三营没有回音，电讯已断，等了很久，似乎是凶多吉少。

早上四点多，我便派一个排长去查线，他到了第三营阵地，发现尸体横籍，摸到其中有一穿皮夹克和

皮鞋的，用手电筒一照，就是团长。他连忙回来报告。我忍着热泪向总团长报告耗音。他也深受刺激，竟对我说：“他死了，为什么你不一起死？”我说：“先一天你规定团长和团附一在指挥所一在前线，所以我没跟他在一起。”他说：“要抢下他的尸体，抢不下枪毙！”

这时天快亮，本来不适于在前线活动，但是军令如山，不得不遵。我带了一排人冲上去，敌人的枪炮火力已加强了，飞机也活动了，只要我们行动，目标显著，火力便集中攻击我们。我们分三次冲锋，不到三百公尺，一排人都打光了，我附近飞来一颗炮弹，击中烂泥巴，把我弹起三四尺，我以为这下完了，没想到没受一点伤。我回指挥所再带第三排，再冲上去，又打光了。下半我带通讯兵、迫击炮连及弹药兵，共二十几个，又打光了。我只得上孙立人的阵地去借兵。



（沪战共三个月，敌我死伤均重。此为我上海伤兵医院）

先遇到他们第一营营长李邦钦，他还有四五百人，不肯借我。我找到第三营营长张再平，他说他不敢做

主，就在他营部打电话给孙立人，孙指示不借。我可真走投无路，就在第三营营部打电话给黄杰，黄不在，参谋长周学海接电话，我向他报告：“今天我奉命抢团长尸体，在我手上已牺牲一百多人了，我不是怕死，我来第四团借兵，准备再去，可是借不到。现在准备一个人上去，从现在劳声寰这个名字不再提了。”说完放下电话，一个人就往前线冲上去。

大概离营指挥所五十公尺左右，张营长所派的兵追上来把我拉住，他说奉周参谋长命令拉我回去接电话。周参谋长说：“声寰，我已报告总团长了，干部伤亡太多了，不能再牺牲了，总团长的话是气话，你这种干部不能牺牲。你马上收容部队，孙立人还有七八百人，你把正面交给他，今夜你们跟三十六师反攻上去，把团长尸体给抢回来，过去的不谈了。”

我奉命把正面交给孙立人，而三十六师又奉命接孙的原来防地。我即刻收容余部，可怜得很，当时只剩二十几个人。当夜我跟总团部炮兵营长贾幼慧联络，要求炮兵射击掩护，炮声一响，我们二十几个人随第四团冲入刘家宅内，把丘团长尸首抢回来。后来运到南京军人公墓安葬。



(中国军队固守阵地)

任务完成之后，我再收集余部，共有一百五十名，但因团的番号尚未撤消，我升充代理团长。我团在指挥系统上原属孙立人指挥，我特地去孙的指挥所报告一切。他要我率所部做他的预备队，在虹桥路集中。当我离开孙指挥所不到一百公尺时，不幸敌炮击中指挥所门口，孙负重伤，抬赴上海体仁医院疗治，此后他未再亲临淞沪战阵。我团后来归五十师指挥，守荻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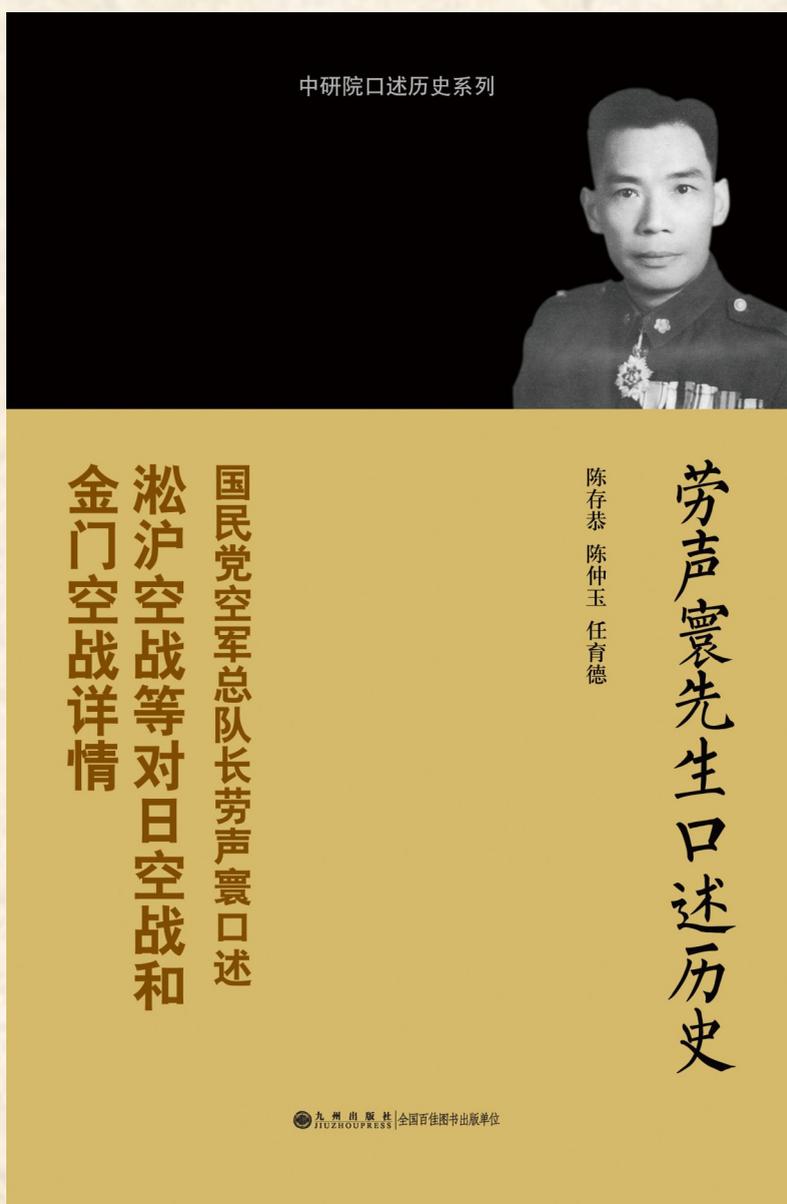
淞沪战事终因敌人在金山卫登陆，有切断我大军后路之虞，而不得不撤退。我团当然无法整补恢复战斗的力量。我们沿着京沪路撤退，一面还对付追兵的袭击，一面要防备来自天空敌机的炸射，我们有十几条舢板，尚有余力协助从上海逃出来的难民退到南京。我们又退到蚌埠。我团因人数太少，在编整时编入唐守治团，我奉命到汉口担任战干第一团的队官。

战干团专收容逃难青年，训练为抗战的干部。团长是委座兼，副团长为陈诚，教育长桂永清。但因周至柔和蒋坚忍知道我回到武汉了，便要调我回空军去工作，桂永清最初回绝了，蒋坚忍特地专函向桂要求，婉称借调半年，桂不便坚拒，我才回到离开了两年有余的空军。

本文选摘自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劳声寰先生口述历史》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劳声寰，广东南海人。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军官教育总队、中央航空学校陆空联络训练班。历任空军入伍生总队长、驱逐总队长、空军特务第六团团团长兼飞行基地陆战指挥官等职，在台曾任“国防部”参议、总政治部高参。

《口述历史系列：劳声寰先生口述历史》记录口述者参加北伐战役、抗战、国共内战等经历。附录口述者撰写的书面补充材料，细述淞沪大会战、川西空战、金门战役等详情。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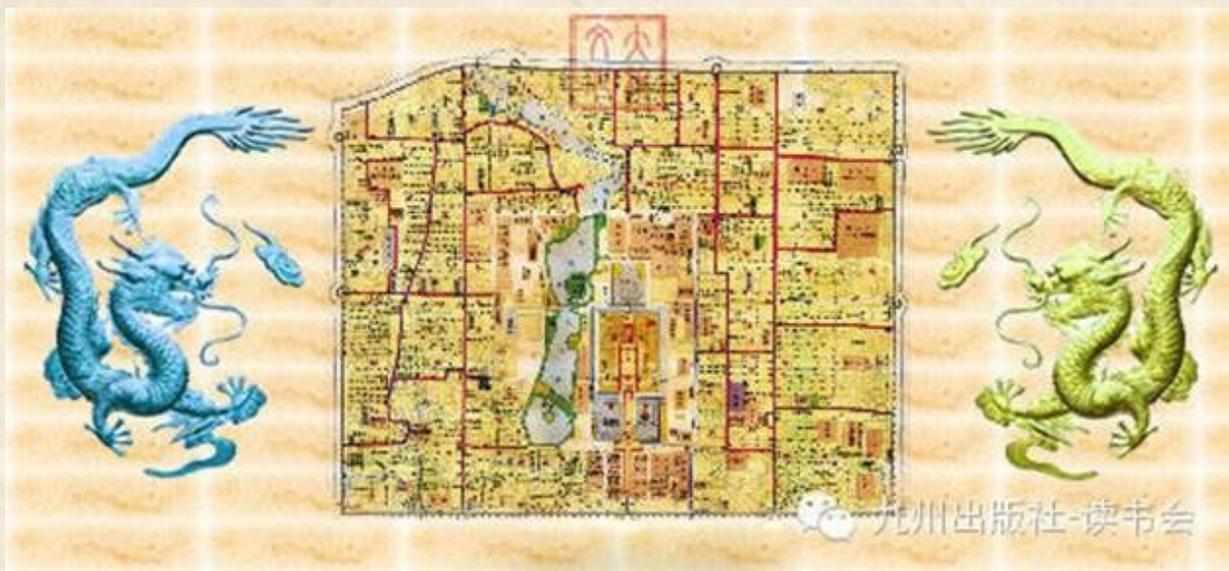




揭秘明代北京城的“双龙”布局

◎ 树 军

北京列于我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首,是我国古建筑最多的城市。元、明、清历代的立苑、坛庙、塔寺分布在全城各处,它们各具特色,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北

京列于我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首,是我国古建筑最多的城市。元、明、清历代的立苑、坛庙、塔寺分布在全城各处,它们各具特色,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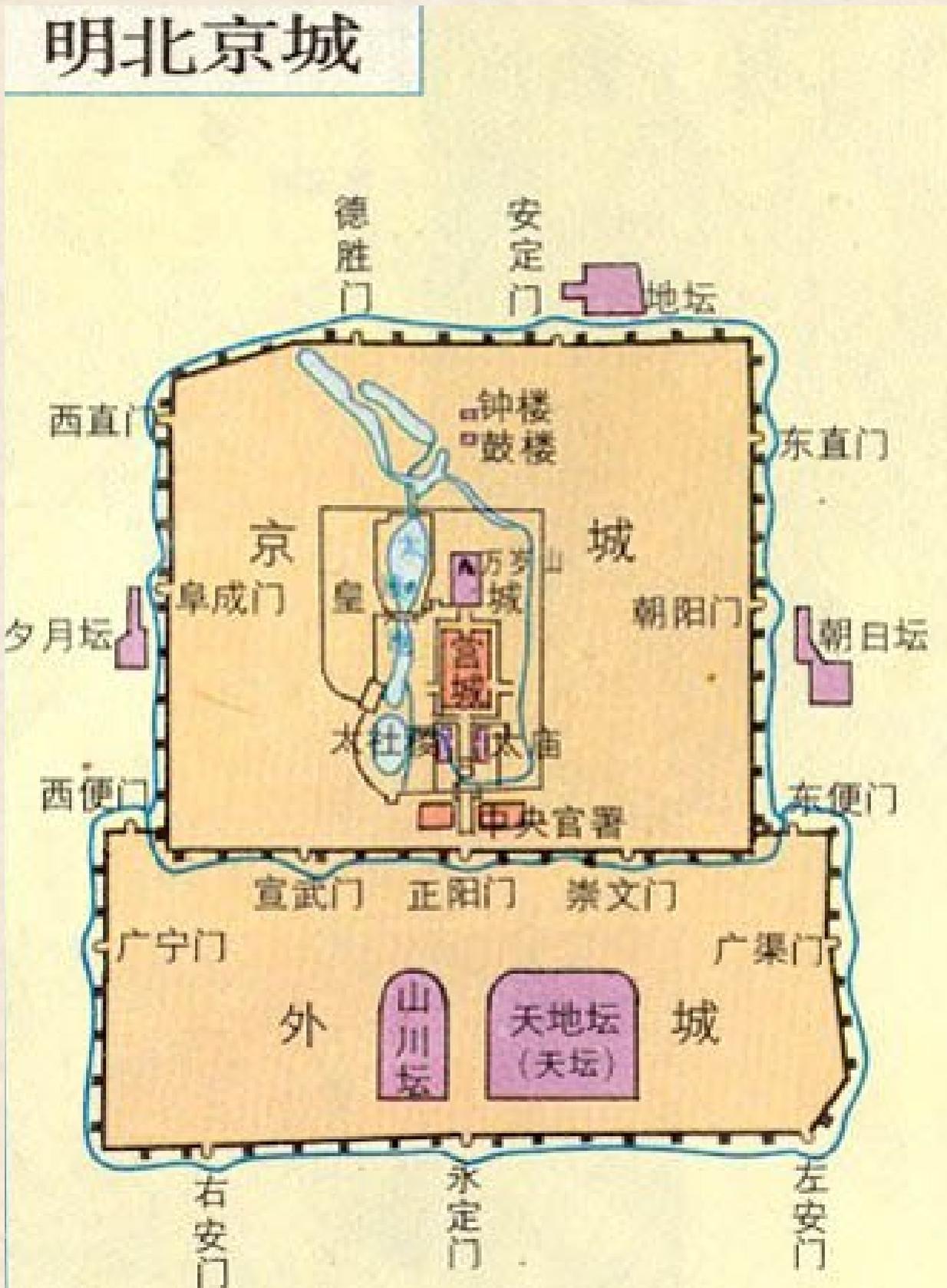
大规模建筑北京城始于明代。

明朝建国后,初时定都南京。后来,围绕京城的搬迁,朝廷内部发生许多争议。有人以南京偏于东南隅,不宜控制全国为理由提议都城设在位置居中的西安;有人则以巩固北疆,防范外族袭扰为由,主张迁都北京;还有人以安徽凤阳为太祖故里,有帝王之气,力主迁都凤阳,等等。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政权,是为明成祖,即永乐帝。朱棣称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迁都北京。

明代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加以扩建和改建的。自外而内分为都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宫城居中,与皇城和都城层层相套,这是北宋都城东京“罗城”规划的形制,与宋以前宫城居北的布局不同。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于城南加建一道外城,加强

城防,并将手工业和商业区纳入城内予以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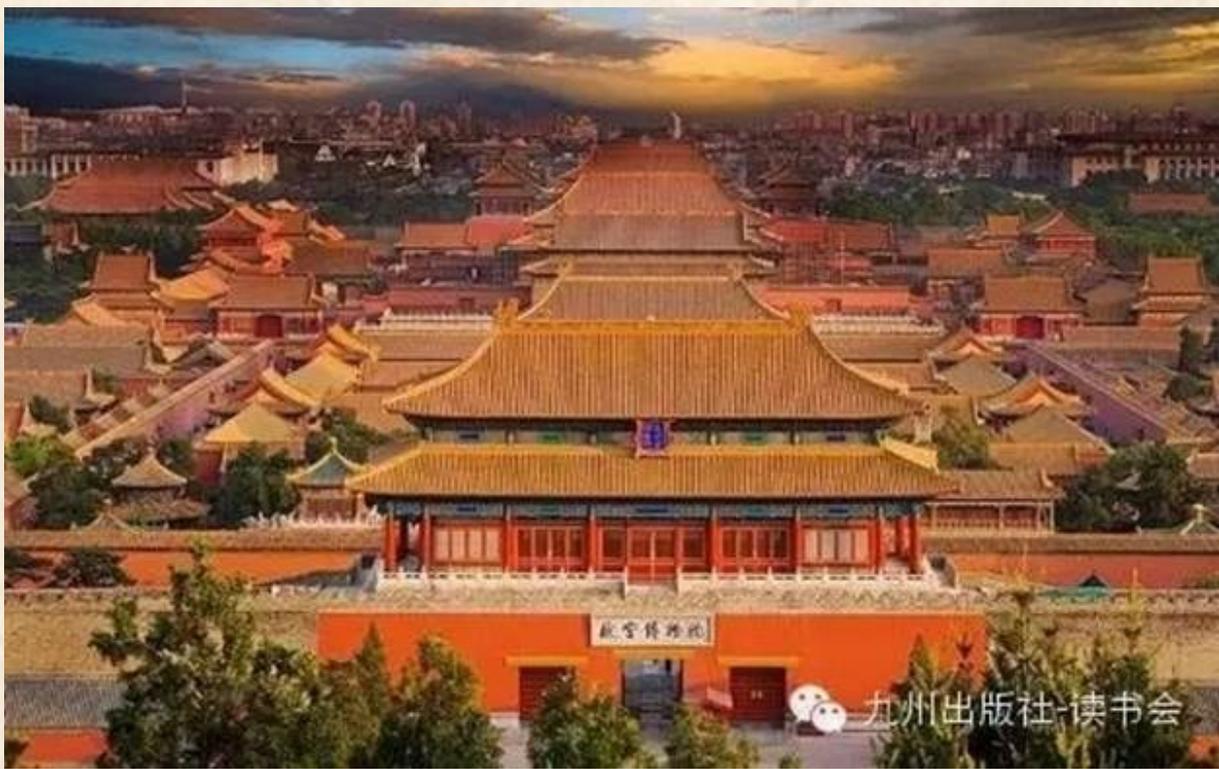
北京外城东西宽 7950 米,南北 3100 米;南面设右安、永安,左安三门,东西两端各设一门,东为广渠门,西为广安门;北面东西两端为东便门和西便门;中间三门即内城的南三门。

内城东西宽 6650 米,南北 5350 米;南设宣武、正阳、崇文三门;东西各设两门,东为东直门和朝阳门,西为西直门和阜成门。这些城门设有向外的箭楼和

靠内的城楼，以及城墙围合而成的瓮城，其内驻扎军队，是城防的中心。例如，前门是箭楼，正阳门则为城楼。内城在东南和西南和城角处，还建有角楼。

皇城，位于内城的中心稍偏南，东西宽2500米，南北长2730米。南开一门为天安门，其南原建有一座大明门（清时称大清门）为皇城的前导。皇城以内沿轴线及其两侧的即是宫城，现称为故宫。宫外布置坛庙、禁苑、寺观、衙署、宅邸等建筑和园林。

明清北京城，体现了以宫室为主体的城市规划思想。贯穿这个主规则的是一条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上及两旁建筑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利用建筑的形体及空间的分配，把所有建筑联系在一起，是北京古建筑的精华所在。

从外城的永定门开始的中轴线，向北到了内城的第一个重点建筑——雄伟的正阳门楼及箭楼。再往北经过皇城正中的天安门、端门，到达紫禁城的午门，

然后穿过故宫中心的三大殿，出神武门，越过景山中峰的万春亭，止于地安门外的鼓楼和钟楼。

这条中轴线到达钟鼓楼以后，不向北延伸到城根，而是恰到好处地结束了。它这时把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内城的北城楼——东西对称的安定门和德胜门。

最近，有关专家对北京景山地区的遥感航摄照片进行了研究，发现这里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是一组拟人化的建筑。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兴趣和关注。

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利用遥感技术所拍摄的全北京城鸟瞰照片，翻阅了大量有关史料，相互印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是双龙布局形状。一条水龙和一条陆龙衔山环水，蔚为奇观。

北京的“双龙”，水龙以南海为龙头部分，湖心岛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是龙尾，摆向西北方向。



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颌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坛如同龙眼，故宫恰似龙的九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正阳门好似一宝珠。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极富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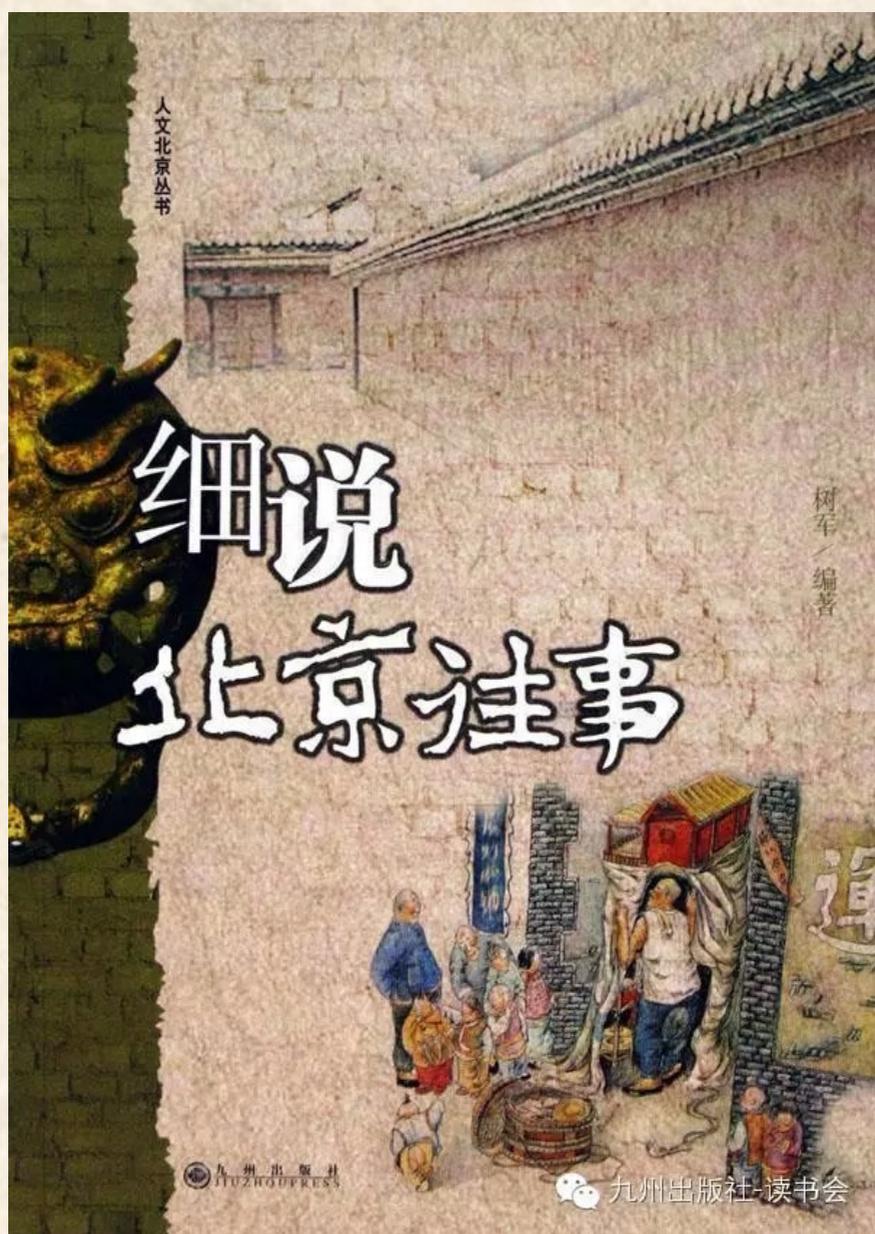
北京是历史名城，明代北京城建筑的这种“双龙”布局设计，反映了在华夏民族历史上君权神受的皇权思想。不言而喻，北京乃兴龙之地，封建帝王乃天降龙种，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者。但这种神奇的双龙布局

设计,究竟是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大师们巧夺天工的艺术造诣,还是天然的巧合,仍是一个谜。

本篇内容选摘自《细说北京往事》

树军编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展示北京迷人的风情画卷，凸现北京辉煌的人文风姿！本书呈现的是北京建都八百多年来，上至皇宫下至民间底层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无奇不有的民间传说，各具特色的社会习俗等，细说113则皇都北京之“谜事”“秘事”“怪事”“婚事”“丧事”“幸事”“憾事”和“耻事”，精心选配珍贵老照片等插图90余幅，无一不令人兴味盎然。本书可读，可藏！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克里希那穆提：印记与记忆

◎ 克里希那穆提

专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努力,所以仍然属于一种思考的行为。因此,专注显然无法通往实相……



克：专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努力，所以仍然属于一种思考的行为。因此，专注显然无法通往实相。

讨论：您指出，思考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行动，都是思考者的投射。

克：正是如此，先生。

讨论：换言之，您把觉知和思想区分开来了。

克：我会阐释得慢一些。当我们谈论专注的时候，专注意味着强迫、排除，意味着对某个排他的事物感兴趣，这里面包含着选择。这意味着思考者的努力，而这会让思考者得到强化。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所以，我们必须探究一下有关思想的问题。何谓

思想？思想是指对某个情形的反应，这表示思想是记忆的反应，而属于过去的记忆如何能够创造出永恒呢？



讨论：我们并没有说记忆创造了永恒，因为记忆是缺乏觉知的东西。

克：它是无意识的、潜意识的，这是源于它自身的无知无觉的妥协。我们正努力去探明我们所谓的思考是何意思。若想弄明白这一问题，就不要去查阅字典，而是应当审视一下你自己。你所说的思考是指什么呢？当你声称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你是在反应，你通过自己过去的记忆在做出反应。那么，何谓记忆呢？记忆是指经历，昨天的经历的储藏、累积，无论是集体的经历还是个体的。昨天的经历便是记忆。我们何时会记住某个经历呢？

很显然，只有当该经历不完整的时候才会如此。我怀有某个经历，这一经历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它留下了一个印记，我把这一印记叫做记忆。记忆对进一步的挑战做出反应，记忆对挑战所做的反应，被称作思考。



讨论：印记留下什么在上面了呢？

克：留在“我”身上了。毕竟，“我”、“我的”，是所有集体的、种族的和个体的记忆的残留物。这捆记忆便是“我”，而这个“我”及其记忆在做出反应。该反应被叫做思考。

讨论：这些记忆为什么会被捆绑在一起呢？



克:因为认同。我有意或无意地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一个袋子里头。

讨论:所以,有一个脱离记忆的袋子。

克:记忆便是这个袋子。

讨论:记忆为何会粘在一起呢?

克: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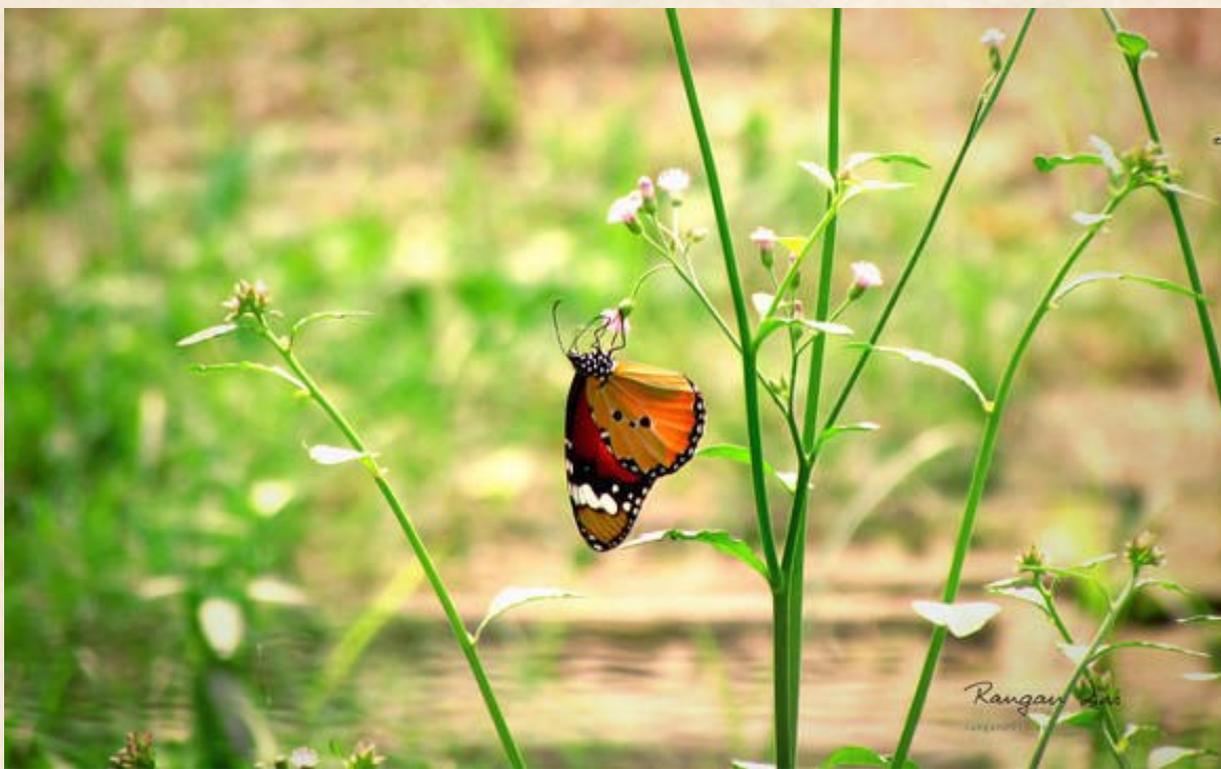
讨论:可记忆并不存在,除非有某个人去记住,否则它们将处于一种惰性的状态。

克:换句话说,记忆者跟记忆是分开的吗?记忆者同记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没有记忆,就不会存在记忆者;若没有记忆者,也不会出现任何记忆。

讨论:我们为什么坚持要把感知者与感知、记忆者与记忆分离开来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困惑的根源所在吗?

克: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二者分离开来,是因为记忆者、体验者、思考者通过隔离而变得永久。记忆显然是稍纵即逝的,于是记忆者、体验者、心灵便把自己

划分开来,因为它渴望获得永恒。



假如一个心灵展开努力、进行选择、接受训练和自制,那么它显然就无法找到实相。因为,正如我们所指出来的那样,它通过这种努力把自己投射出来,让思考者得以维系。那么,如何让思考者从他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呢?这便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

原因是,无论他思考的是什么,都一定是过去的产物,于是他便通过记忆制造出了神、真理,而这显然不是真实的。换言之,心灵不断从已知移向未知。当记忆发挥作用的时候,心灵就只会在已知的领域内运动,它永远无法认识未知。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于,怎样让心灵挣脱已知的束缚。若我们想从已知的制约中解放出来,那么任何努力都是有害的,因为努力依然属于已知。所以,必须停止一切努力。

你是否曾经试图做到不采取任何努力呢？如果我认识到一切努力皆为徒劳，一切努力都是心灵、“我”、思考者的进一步投射，如果我清楚地看到了瓶子上贴着的“毒药”的标签，那么我就不会去碰它了。不要做任何的努力，以便不为它所吸引。



同样的，最大的困难也正在于此——假若我意识到我的丝毫努力都是有害的，假若我领悟到了这其中的真理，那么我就会不做出任何努力。我们采取的任何努力均是有害的，然而我们并不能确定，因为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渴望有所成就，这便是我们的困难所在。结果我们便不断地展开努力、奋斗。

然而，神、真理并不是某个结果、终点或奖赏。显然，一定是它向我们走来，我们是无法朝它走去的。

只要我们努力去获得它，便是在寻求某个结果、便是想要有所得。然而，为了让真理降临，一个人就得做到无为的觉知。



无为的觉知，是一种不展开任何努力的状态，是指在不做评判、不做选择的情形下实现觉知，不是在最终意义上，而是指在各个方面都如此——无为的觉知，意思是指意识到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相关的反应，但不做选择、不进行谴责、既不认同也不否定，如此一来，心灵才能开始在不进行评判的情况下去认识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这又引起了如下问题：即是否能够在没有思想的情况下实现认知？

讨论：当然可以。如果你对某个事物漠不关心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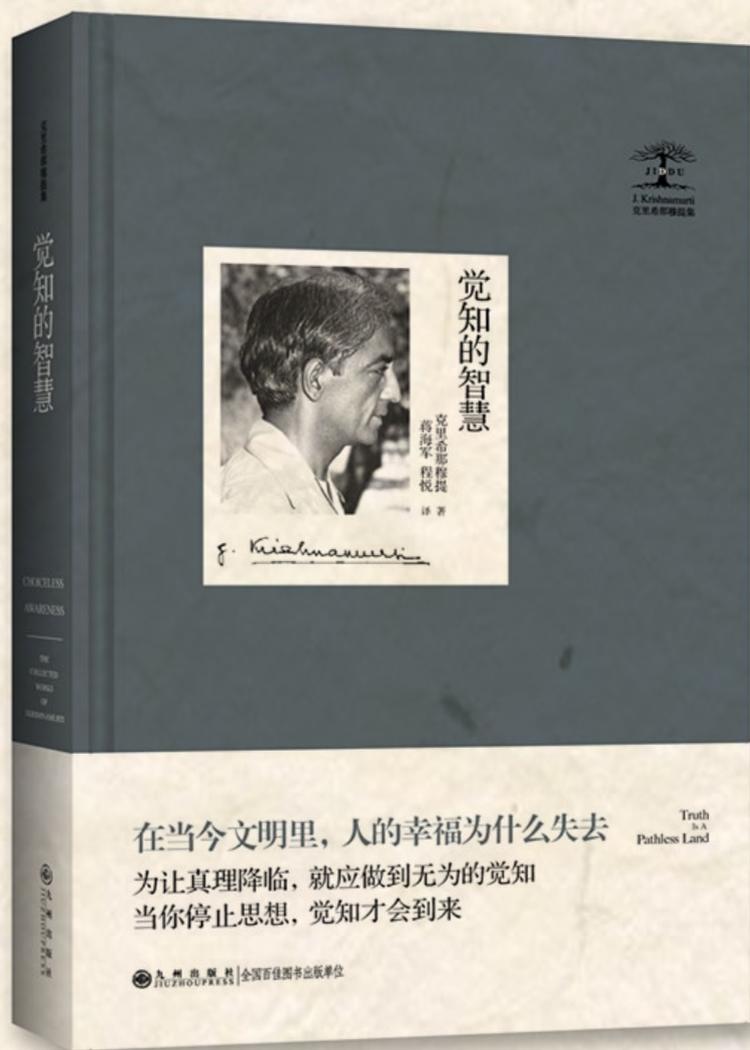
克：先生，冷漠也是一种判断。一个迟钝的心灵、一个冷漠的心灵，是无法实现觉知的。在不做判断的

情形下有所领悟，认识到正在发生的情形，这便是觉知。所以，若没有在当下、在即刻实现觉知，那么寻求神或真理便是徒劳的。去庙宇容易得多，但这只不过是逃避到了推测的领域里。若想了解实相，我们就得直接地认识它。显然，实相不属于时间和空间，它就在当下。当下，便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本文选摘自《觉知的智慧》

克里希那穆提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是《克里希那穆提集》的第五本，选择了克里希那穆提 1948—1949 年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演讲和讨论。“觉知”是本书集中探讨的话题，我们所面临的生活难题，根源在于我们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与信仰妨碍了我们认识真理。停止思想，放弃努力的愿望，无为地去体验，才能展开心灵的觉知，实现智慧的觉醒。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任思羽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5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讀享 
JIUZHOU PRESS

处暑